

# “宝贝回家”志愿者专救被拐儿童

一个小女孩突然跪在她面前,双手端着一个大铁盆向她伸去。她身上紧紧套着一道绳索,绳索的另一头是一架木板车,一个一条腿的青年男子坐在上面唱歌。

这是2009年5月19日上午,呈现在宋婷面前的一幕。宋婷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同时也是福州“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的一员。

宋婷说:“我感到非常内疚,那个小女孩很有可能是被拐卖,然后被控制乞讨的,当时我应该打电话报警才对。”

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负责人薛健告诉记者,目前在“宝贝回家”登记的志愿者已超过1.4万名,遍布全国大多数省份。他们利用工作之余发现并搜集流浪乞讨或被拐卖儿童的信息,并将信息发送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和“宝贝回家”寻亲网建立的数据库。

## 建立“宝贝回家”公益寻亲网站

张宝艳的儿子5岁时曾遭遇“被拐”,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被拐儿童。

1992年的一天,张宝艳的母亲带孩子去市场,只顾逛市场的张母回头一看,发现孩子不见了。张母赶忙让人帮忙在市场中找,但没有找到。

“当我妈跑到单位告诉我孩子没了时,我一下就蒙了,感觉天都要塌了。”张宝艳说。

幸运的是,当天晚上,张宝艳找到了自己的儿子。“透彻体会到丢失孩子的父母焦急、痛苦、绝望等心情”的张宝艳,

从此开始留心儿童走失、被拐卖的事情,并为寻子的家长提供帮助。起初,张宝艳提供的帮助主要是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到处打听被拐儿童的相关信息,帮助张贴寻人启事,或者到派出所报警。后来,她意识到这种方式太原始了,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取得的效果也不理想。

于是,她开始寻思一个“更快捷、更方便的寻找方式”。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宝艳发现互联网上有一些专门发布寻人信息的网站。这个发现让张宝艳感到非常惊喜。通过网络将寻人信息都展示出来,通过对比核查,能极大地提高寻找儿童的效率。

但她发现,当时几乎所有寻人网站发布信息都要收取费用。“很多家长长年在外奔波寻子,经济已相当困难了,这个时候就是让他们掏五六百元也很不容易。”

她和在通辽师范学院网络技术部门工作的丈夫商量,决定建一个公益性的寻子网站。

2007年4月30日,“宝贝回家”公益寻子网站诞生了。刚开始,网站的设想非常简单,只是供被拐儿童的家长将自己孩子的照片、特征描述等信息发布到网上。逐渐地,一些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寻子的家长,主动将在寻子过程中得到的其他被拐儿童的信息也发布到网上共享。后来,一些浏览过“宝贝回家”网站的普通网友开始主动到福利院、街头将被收留、流浪、乞讨儿童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

2008年1月18日,“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在张宝艳的家乡——吉林省通化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张宝艳现在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每天,她早上六七点就会上线,维护网站内

容和管理全国近70个志愿者群,搜集新闻。发现需要求助的信息时,她会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遇到紧急情况时,她会立即发到全国的各个群中。

张宝艳始终坚持网站的公益性。到目前为止,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共出现过两个商业性链接:一个是某商业网站,该网站为“宝贝回家”开通了一条热线,全国各地的家长和志愿者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张宝艳取得联系,无需支付长途通话费;另一个是山东某生物食品公司的网站,该公司制作了几十万张印有丢失儿童头像和信息的小卡片,并将小卡片贴在该公司生产的饮料瓶上。

张宝艳说,这是她仅有的两次妥协。

## 街头流浪乞儿成志愿者救助重点

提起志愿者“仔仔”,大多数福建志愿者都会对其竖起大拇指。“仔仔”是志愿者曹先生在“宝贝回家”中的网名。“仔仔”是一位曾协助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打掉特大传销团伙的四川小伙子,现在,他是“宝贝回家”的一名志愿者。2009年8月,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一则被拐儿童的线索后,孤身前往漳州协助当地警方解救出这名儿童。当时,他在接受福建当地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这是我参与解救出来的第41名被拐儿童。”

事实上,大多数志愿者都不是如“仔仔”般的“孤胆英雄”,而是像宋婷那样的城市上班族。囿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他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对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上。

“解救被拐儿童,志愿者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技术性且危险性大,而救助在城市中流浪乞讨的儿童却是

相对容易做到的。”张宝艳对记者说,后者是目前“宝贝回家”志愿者的行动重点。

街头流浪乞讨儿童形形色色,通过长期的观察,福州的志愿者将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形象划为了三类:

一是“拖车党”:一个小孩子拖着一辆板车,车上绑着个大音箱,还有一个“残疾”成年人坐在上面唱歌。那大人就是监工,要挟、指令拖车的孩子去要钱。二是“昏睡党”:在市区的繁华位置,一个成年人抱着一个昏睡的小孩儿,以此博取路人的同情乞讨。三是“求助党”:一个成年人带着几个小孩儿跪在街上,指使小孩儿不停地磕头、哭泣乞讨。

遇到上述情况,志愿者一般会先在附近观察,看周围有无监控,盯梢。然后再试探性地询问行乞的成年人一些情况,如家在哪里,小孩的名字、年龄等。

而更多的志愿者,是将网上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对比,帮助儿童回家。今年9月11日,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小精灵”(应其要求用网名)在“宝贝回家”网站的论坛看到“寻儿石小乙”的寻亲信息,该信息显示,石小乙是2005年在北京与家人走失的。

随后,“小精灵”便将该信息转贴到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QQ群中。当天便有群中的志愿者反映称,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曾在“宝贝回家”论坛中,发过一个在京和家人走散的名叫“张小毅”的寻亲信息。“小精灵”一方面动员志愿者从浩如烟海的帖子中找出“张小毅”的帖子,一方面联系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反映情况,并把从该中心拿到的“张小毅”的照片和寻亲帖中“石小乙”的照片传

给了“宝贝回家”志愿者信息对比组。对比组反馈的信息是: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9月14日,“小精灵”辗转与寻亲者取得了联系。“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张小毅’就是我儿子。”为寻子在北京沿街乞讨、睡大街,一度曾攀上北京站前的天桥想了断生命的河南汉子石新旺激动地说。

9月16日上午11点,石新旺在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见到了分离4年的儿子,“他一看到我就跑过来喊爸爸。4年不见,在该保护中心的照顾下,他长高了很多,我非常感激他们。”石新旺说。

## 志愿者行动遭遇的困境

在张宝艳看来,让更多被拐儿童回家的坚实基础是志愿者搜集的信息充分可靠。但信息的充分可靠意味着志愿者在行动中要遭遇更多的危险、误解和指责。

2009年6月,厦门“宝贝回家”志愿者黄佑明和10多位当地志愿者一起在内市搜寻“拖车党”的行踪。他们在跟踪一段时间后,发现,每天晚上11点多,会有三轮摩托车将分散于厦门各地的“拖车党”拉到厦门马垵的一处停车场。该停车场停着一大一小两辆安徽牌照的卡车。晚上,控制着10多个小孩儿的“拖车党”就在车厢内休息。凌晨时分,小孩儿又会被三轮摩托车拉到厦门各条繁华的街道上。

“拖车上的成年人和拉拖车孩子的关系十分值得怀疑,没有哪个父母会狠心让自己的孩子在烈日和风雨中拉着沉重的拖车乞讨。”黄佑明说。探清“拖车党”每日有规律的集结和分散后,黄佑明认为这些人是“有组织,流动的职业乞讨者,而孩子们很有可能是被控制起来的。”

跟踪过程时刻面临着危险。一天,一名志愿者在石鼓山立交桥附近发现了一辆经常停放在马垵停车场的卡车。当这位志愿者靠上去想掀开车厢后帘时,车内突然站出几个大汉向这名志愿者逼了过来。

为了便于志愿者沟通,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创建了一个QQ群,但加入这个QQ群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验证和核查,“我们要保证群里的人都是志愿者,这样我们相互交流的信息才不会被泄露。”除了不可预测的危险,志愿者们还会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而遭受别人的误解和指责。

2009年5月24日下午,金剑辉在福州大洋百货门口发现一例“昏睡党”:两个男孩躺在毯子上昏睡,一个中年妇女跪地乞讨。金剑辉观察一段时间后后拨打了110。约10分钟后,福州市鼓楼区东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并将这位妇女和小孩儿带到了派出所。

在东街派出所,民警询问那个妇女,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而这位妇女除了说“从贵州来”外,只是摇头,表示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

金剑辉通过当地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找来了一位在福州工作的贵州人做翻译,但仍旧毫无突破。晚上10点,所长亲自来询问情况,并“开始面露不悦”,值班民警也开始指责金剑辉在没有确凿证据下就报警,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对方是人贩子,是滥用警力。

又过了1小时后,福州东街派出所决定放人,并要求金剑辉向那位妇女道歉。“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报警,能查出一例是一例,每查出一例,就是挽救了一个儿童的幸福啊。”金剑辉说。 据《中国青年报》

# 奥数思维训练磨掉孩子自信

## 容易题不敢做 生怕里面藏陷阱

“请把上题中数量小于3的一幅图找出来”,刚上小学一年级的的小西正在做家庭作业,这道题并不难,题中共画了3幅图,一幅是5个苹果、一幅2支铅笔、一幅是3个梨。

可是小西却被难住了。“这道题不可能这么简单,里面一定还有什么我没看出来的,比如5个苹果减去3个梨是2,这个是不是也应该选出来呀?”

“我发现这孩子做难题做的已经不会做容易题了,好像一道题不绕几个弯子就不是题,如果不能从表面意思中找出隐含的意思就肯定掉‘陷阱’里了,都是做那些奥数题闹的。”女儿的回答让李凌有些束手无策。

让李凌感到更加困惑的是,孩子学的东西越来越“别扭”了,有话绝不直说,总得绕上几个弯才行,“在奥数这个‘数学杂技’的带动下,各个学科似乎都开始向‘杂技’训练方向发展了”,李凌说。

刚上学的那几天,一次,小西在家里不停地嘟囔着:“明天”“昨天”“昨天的昨天”……

原来,老师为了让孩子们弄懂时间概念,出了几个题:昨天的前天是哪天、明天的明天是哪天、昨天的后天是星期几、明天的前天是星期几?

“我知道老师是让孩子搞清楚昨天、今天、明天以及前天、后天等的关系,其实,让孩子知道明天的明天是后天,昨

天的昨天是前天就完全可以了,日常生活中谁会问你明天的前天是哪一天呢?”李凌说。

都说孩子的思维能力是可以训练的,“但是也不是这么个练法”,李凌说,孩子在令人混乱的文字游戏中很难真正提高思维能力。可在现实中,像李凌所说的为了“绕”而“绕”的题目随处可见。

在一个著名的奥数网上,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每天都写一篇日志来记录自己的小升初历程。在他的日志中几乎每天都会出一道奥数题向大家求解。

在一天的日志中,他这样写到:“今天的题有点神经!上午8点8分,小明骑自行车从家里出发,8分钟后,爸爸骑摩托车追他去,在离家4km的地方追上了,然后爸爸立即回家,到家又去追小明!!!!(神经的老爸!吃饱了撑的!)再追上小明的时间,恰好离家是8km,这时是几点几分?”

## 处处难为孩子的变态逻辑向幼儿园蔓延

当水把一个平面填满之后,自然就会向下流,这种“绕”孩子的状况也不例外。

“您没给孩子报奥数呀?”开学近两个月了,李老师忍不住问家长冯先生,“每年那么多课外班里,英语和奥数报名的孩子最多,报这两个班将来对孩子的升学很有帮助。”

李老师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家长冯先生是一个3岁7个月小姑娘的父亲。

开学不久,幼儿园就给每个家长发了一份课外辅导班的课程表,有英语、舞蹈、美术、武

术、科普等,其中还有一门课叫数学训练,“我觉得这门课有点儿可疑,特别怕跟奥数有关”,冯先生说。

冯先生知道自己同事上小学的孩子几乎都在学奥数和英语,大人累、孩子更累,冯先生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将来也免不了“遭这个罪”,“可是我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

“您不让她学,可别的孩子都学呀,现在让她接触难题将来上学再见到这些问题时就不觉得难了,您现在让孩子轻松了将来就有人难为她了。”李老师这样给冯先生解释。

“我看这根本就是在难为孩子。”这句话冯先生没敢当着老师的面说,但是心里却升起了一股无名火:“这种美其名曰为了孩子而想方设法给孩子出难题的‘变态’逻辑真是让人气愤。”

上个周末,老师发给每名家长一张塑封好的作业纸,让家长帮助孩子复习巩固有关个位和十位的知识。

冯先生按照老师说的方法,用彩色笔画了一串5个珠子,让女儿数数,女儿说是5个,于是,冯先生在这串珠子下面写下了“5”;然后他在这串珠子左边又画上了一串10个珠子,还让女儿数,女儿缓慢地数出了10个,“那你说这里有几串这样的珠子呀?”“1串”,女儿回答,于是,冯先生便在这串珠子下面写下了一个“1”。“不是10吗?你怎么写了个1”,女儿问,冯先生给女儿解释这个1代表1串10个珠子,是十位。可是,任凭冯先生怎么解释,女儿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10个小珠子下

面写上“1”。

“我记得自己到小学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个位什么叫十位,这对于仅仅3岁多的孩子来说太难了,她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冯先生说。

## “羊群效应”在作怪

“这是一种‘羊群效应’在作怪。”山东的贾先生说。

贾先生是一名大学教师,他的儿子刚上小学。贾先生发现刚上学两个月的孩子对学校的课程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是很积极的,为什么到了小学就没有积极性了?”

贾先生很纳闷。仔细了解后发现,原来儿子这两个月的课程,早在幼儿园小班就学过了。他认真翻看了儿子一年级的数学课本后发现,整个一年级的课程几乎都在大班学完了。

“这样重复学习,孩子怎么能有兴趣?”贾先生很忧虑。冯先生也有类似的忧虑,她的女儿现在汉语拼音已经从a、o、e学到了g、k、h,据班里老师介绍,到这学期结束的时候会学完所有的声母。

所谓的“羊群效应”是在一群羊前面横放一根木棍,第一只羊跳了过去,第二只、第三只也会跟着跳过去;这时,把那根棍子撤走,后面的羊,走到这里,仍然像前面的羊一样,向上跳一下,尽管拦路的棍子已经不在了。

虽然全国各地都在对以奥数为首的课外辅导班进行声讨,主管部门的“严惩”之声也不断,但是,对于“羊群”中的孩子们来说,只能看着前面的羊,只要前面的羊跳了过去,它一定也

会跳过去的,甚至跳得更高。

那位在论坛上天天写日志的小学生在做一道题“4444=11”时,是这样写的:4的阶乘除以4的开平方再减去4除以4的商。看来这只“小羊”跳得

很高。我和数学就像古龙小说中的两个高手,一见面我就知道自己会败

“羊群效应”真的能让“小羊”越跳越高吗?

蔡先生的女儿晓晴刚熬过了痛苦的“小升初”。晓晴是个文科极强的孩子,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古文观止》中的篇目是父女两个经常聊天的话题。

但是,晓晴非常惧怕数学,不仅惧怕复杂的奥数题,连简单的算术题都害怕。

那天,蔡先生和女儿无意间聊起了区时,便找出一本地理书给女儿讲起了经度、纬度,没想到女儿一下子紧张起来,“爸爸,这个太难了,我弄不懂”。“一点儿都不难,就是简单的计算。”蔡先生说。

但是,女儿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再听蔡先生讲下去了。

数学一直是女儿的“短板”,为了让女儿能把“短板”稍微提高一点,蔡先生让女儿参加了奥数培训,尤其是在备战“小升初”的那段日子里,晓晴每天都在不停地做题,反复地计算。

最终,晓晴的数学并没有进步多少,但是对数学的惧怕却在与日俱增。

一次,晓晴对蔡先生说:“我和数学就像古龙小说中的

不同派别的高手,任凭我能打败多少英雄,但是只要我跟数学这个高手一碰面,不用出招,我就知道自己打不过他,爸爸你別让我学了。”

蔡先生发现,长时间的奥数训练没有让长着文科脑袋的女儿掌握数学思维的技巧,反而强化了她记忆和背诵每一道题的能力,“只要题目和做过的题稍微有些不同,女儿就不会了”。

更让蔡先生恐惧的是,敏感的女儿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低能”,她已经连小学最简单的计算都开始怕了。

“她是对与数字有关的所有知识都失去了自信”,蔡先生说。

“太可怕了”,蔡先生说,明年晓晴就将升入初二,到时候化学、物理等理科课程都会开设,“我怕到那时候,晓晴会彻底对学习失去信心”。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点。”这几乎是每个中国家长的期望。前两天,冯先生接女儿的时候,女儿手里拿着一个小拼音本,“爸爸,这个作业本上,老师让我今天在作业本上画拼音”。冯先生打开本子看到,第一篇的前6行的开头,老师分别写上了a、o、e、i、u、ü,看来这天的作业是把这些拼音各写一行。

3岁多的小姑娘根本不知道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作业本。冯先生决定不强迫女儿完成这份作业,因为他不希望女儿用抢跑的方式在起点获得领先,他希望女儿的每一步都能扎实、稳健,最终成为终点的胜出者。

一次,晓晴对蔡先生说:“我和数学就像古龙小说中的